



为什么如此执着地书写中国乡村

□ 付秀莹

时代巨变中，一些东西烟消云散了，一些东西在悄悄地重建。更有一些东西，中国乡土文化中积淀最深厚的那一部分，依然在那里坚硬地存在着。

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，我的泪水和人民的泪水，是流在一起了。作为一个小说家，我尽了自己的艺术本分，尽了我的笔墨之责。我想，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执着地书写中国乡村。



我的故乡是河北省无极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，在我的小说里，叫作芳村。我在芳村出生，长大，那个小小的村落，盛放着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，漫长的，寂静的，有着淡金色的投影，同村庄的草木庄稼月光蝉鸣缠绕在一起。我曾经无数次，回忆起多年前那个清晨，我离开芳村，去县城读书。深秋的村庄幽深而神秘，雾霭弥漫，遥遥的，仿佛有鸡啼。父亲帮我驮着行李，母亲在村口送我。那一条青草蔓延的村路，通往远方，通往未知漫长的岁月。一个10来岁的小女孩，除却离家的淡淡的哀伤，更多的是对前程隐隐的担忧，对外面世界的想象、猜测和期待。

我不知道，多年前那个秋天的早晨，是我对故乡最初的辞别。我更不知道的是，此一别，山高水长，关山迢递。我在离乡的路上越走越远，永不能再回头。

多年以后，当我经历了人世的风雨，品尝了生活的甘苦，偶然地拿起笔写作的时候，情不自禁地，我把目光投向了芳村。芳村是我血脉的源头，是我的精神根据地，是我在尘世行走多年不致迷失的秘密，是我的文学想象的全部源泉。写芳村，几乎是我的一种本能，也甚或是我的一种宿命。那是我的来处和归处。

这么多年了，父亲已经进入了他的暮年。而母亲，已在村庄的泥土里长眠了19个春秋。我独自在异乡漂泊，在命运的跌宕中辗转难安。跌了那么多跟头，吃了那么多苦头，这半生千差万错，漏洞百出，在余下的岁月里，我该如何用手里这支笔，去弥补或者修正？

二

我开始反思我之前的写作。我得承认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写下的，大约

在我的短篇小说《爱情到处流传》里。中国的乡村，天然地同自然万物相融相生。大地，泥土，星空，草木，河流，庄稼，这里有大自然永恒的诗性，有肃穆的神性，庄严的，阔大的，宁静的，悠远的，令人内心妥帖而安宁。乡村以她的博大、温暖和宽厚，无私地喂养一个民族的身体，滋养一个民族的灵魂。

渐渐地，我建构了一个叫作芳村的文学世界，芳村，也成了我的文学地理中的一个重要坐标。这些小说人物的琐细的忧愁，卑微的喜悦，星星般迷离闪烁的梦想，是虚构的，也是真实的，现实和虚构的交错处，是我对故乡苍茫心事的试探，也是我进入故乡内部的投石问路。

我坐在北京的书房里，望着窗外的闲云倏忽间飞过。猜测着，哪一朵是故乡的云彩，哪一块云，它来自芳村。不断有朋友玩笑，要去我的芳村看一看，去看一看旧院，看一看旧院里那一棵茂盛的枣树，去看一看我笔下的那些男人女人。我笑着应着，知道这不过是开玩笑，做不得真的。然而，莫名其妙地，内心深处，竟然有了那么一点小小的动摇，或者叫作心虚。

离开故乡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醉心于一种纸上生活。在纸上，我用文字建构了一个虚拟的世界。我在这个世界里攻城略地，无往而不胜。一个小说家，无论在现实世界里如何卑微，在虚构的文字王国里，她就是国王。然而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是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变得不那么自以为是了？

不过是记忆中的乡土。在那些小说里，更多的是追忆，作为一个远离故土的城市知识分子，对童年经验乡村生活的追忆，怀着对乡村的眷恋，深情回望。那是对旧时光的温柔抚摩，诗性的，忧伤的，浪漫的，带着一种读书人特有的自恋。伤痛也是有的，但那也是美丽的伤痛，经了儿童视角的投射，以及时间的沉淀与过滤，苦难和痛楚被淡化了，留下的只是纯净的悠长的诗意。我不能说那是虚假的诗意，毕竟，那也是我对旧光阴的伤怀和追念，是对时光逝水永不再来的深沉感喟。而且，凭借它们，我找到了一条曲折的返乡之路，足以抚慰一个游子的一腔愁绪满怀离情。然而，扪心自问，我何尝真正碰触过当下时代洪流中的芳村呢。

是从什么时候，给父亲打电话，成了我的日常，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无论是在京，还是出差，每一天，我总要先听一听他的声音，才觉得心安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。不过是说一说家常，问一问寒温。我知道他的一日三餐，知道他的衣裳厚薄。头疼脑热，悲喜哀愁，我都知道。我跟父亲交谈的姿势，就是我跟故乡交谈的姿势。芳村的每一户人家，婚丧嫁娶，爱恨冤仇，乡村内部的肌理和褶皱，我都知道。毕竟，我身上流淌着芳村的血，对于中国乡村人情世故的每一个拐弯抹角处，我都心中有数。我不断地打电话，不断地往返于北京和故乡之间，很多感触很多想法，在心头肿胀着，肿胀着，如鲠在喉。

我笔下的很多人物，《六月半》中的俊省，《迟暮》中的乡村老人，长篇《陌上》里那些普通的乡村男女，翠台，素台，小鸾，望日莲，春米，臭菊，建信，增志，瓶子媳妇……他们不过是中国乡村最平凡的小人物，一

代一代，他们在芳村的土地上生老病死，生生不息，永世的悲欢、哀愁，在无尽的岁月中慢慢湮灭，最终归于泥土。中国传统文化流过千百年，流过世世代代的乡村生活，深厚的丰富的积淀，都在中国乡村日常生活的河床上，默默地留存着。那些乡村人物在他们熟悉的乡土上，在千百年来中国乡土的巨大传统之中，他们自在，从容，不慌不忙。在《陌上》里我多次写到坟地，芳村的田野里种满了庄稼，也种满了坟。房屋，田野，村路，坟地，相互交融，不分彼此。人们在田野里劳作，在坟地旁来来去去。阳光照下来，麦苗青青，露珠滚动，新坟上的纸幡在微风里摇曳。田后房屋上，袅袅炊烟升腾起来。人们恩爱缠绵，或者反目成仇。一代代人渐渐消逝了。人间依然是红尘滚滚，肉香酒浓。这就是中国乡村，这就是最中国的乡村生活。旷达，隐忍，朴素，包容，地母一般沉默，却有着强韧的巨大的生命的力量。这样的一个芳村，这个村庄里的日日夜夜，大约也是每一个村庄的日日夜夜，甚或，正是整个中国的日日夜夜吧？鸡鸣狗吠，日升月落，婚丧嫁娶，人事更迭。一些东西凋谢了，一些东西新生了。一个被中国文化喂养大的人，谁敢说，对这样的日夜不是心中有数的呢？

三

然而，当时代的洪流滚滚而来的时候，我的芳村经历了什么？那些生活其中的人们，男人，女人，老人，孩子，他们还好吗，他们安宁吗，他们是不是也有内心的惊惶，迟疑，彷徨和茫然？大时代的风潮涌动扑面而来的时候，他们该如何自

持，如何在乡土的离散中安放自己？我仿佛看见，他们在剧烈的变化之中，俯仰不定的姿势，百般辗转的神情，听见他们内心的急切的呼喊，还有艰难转身的时候，全身骨节嘎巴作响的声音。

我常常想，假如我不曾读书，假如没有多年前那个秋天的清晨对故乡的辞别，很有可能，我也是芳村众多女子中的一个。跟我的姐姐们一样，在生活的围困中左冲右突，无能为力。在电话里跟远方的亲人诉说着愁肠，竭力克制着，克制着，忽然间却痛哭失声。你相信吗。隔着千里百里，我却真切地参与了芳村的生活，亲口品尝了故乡的悲欢喜乐。经济的难题，伦理的困惑，情感的裂隙，精神的疑问，心灵的颠沛流离……他们的每一个痛点，每一个伤口，每一个复杂微妙不可言说处，我都感同身受。我的眼里含着的是故乡的热泪呀。我笔下的那些乡村人物，是我的乡邻，我的亲人，我的姊妹，更甚至，他们就是我自己。

我想写出他们的心事。大约，写出那些男人女人的心事，也就写出了芳村的心事，写出了千千万万个村庄的心事，写出了乡土中国在一个大时代的浩渺心事。一个小说家的野心，大约便是写出天下人的心事吧。

我想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海洋中汲取养分，以中国人独特的思想、情感和审美，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，表达我们这个时代新的中国经验，写出有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中国旋律。时代巨变中，一些东西烟消云散了，一些东西在悄悄地重建。更有一些东西，中国乡土文化中积淀最深最厚的那一部分，依然在那里坚硬地存在着。乡土中国的苍茫心事，同宏大的时代语境呼应着，有很多意味

深长的东西在里面。

于是，我写了长篇小说《陌上》。散点透视的笔法，几乎是挨家挨户的，写芳村的各色人物，写他们在时代巨变中的命运和悲欢。是谁说的，最难的就是写当下。追忆，因了时空的阻隔，便拥有了足够的审美空间，可以进退有据，可以闪转腾挪。那是过去时态。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，我们总是笃定的，胸有成竹。而写当下，写当下处于矛盾旋涡中的人和事，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正在进行时态。生活是伟大的。生活是复杂的。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。生活永远走在想象力前面。面对庞大的复杂的丰富的变动不屈的生活，小说家该如何以文学的方式，切入现实？是正面强攻呢，还是迂回作战？是短兵相接呢，还是十面埋伏？

在《陌上》里，当芳村的风雨扑面而来时的时候，我们总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大时代的气息，芳村那些人，那些男男女女的隐秘心事，也是乡土中国在大时代里的隐秘心事。从这个意义上，芳村的表情，大约就是时代的表情。芳村的泪水，大约也是时代脸庞上流下的泪水，芳村的微笑，应该也是时代嘴角的微笑。

置身于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，我是把自己全身心投入了。我的呼吸连着人民的呼吸，我的心跳连着人民的心跳。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，我的泪水和人民的泪水，是流在一起了。作为一个小说家，我尽了自己的艺术本分，尽了我的笔墨之责。我想，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执着地书写中国乡村。

创作谈

北桥湾的“桥”

——三里河的前世今生（二）

□ 赵润田

旧日三里河中心地带是三里河大街十字路口，往北过北桥湾，通往南芦草园、中芦草园、北芦草园和草场一至十条以及别的胡同，往南过南桥湾，则是金鱼池、龙须沟、苏家坡、东半壁街等地方。北桥湾就像一个枢纽，2008年以前，从广安门到广渠门的两广大街还未扩建的时候，三里河大街行至南北桥湾，是周围一带最热闹的地方，完全是自然形成的商业中心。

凡能够热闹起来的地方必有地理优势，北桥湾的优势就在于它的桥。有了桥，变无路为通途，四面八方的人都向这儿靠拢，人气儿就有了。

南北桥湾之间的桥，始建于明英宗天顺年间（1457—1465年），历久而坏。武宗正德十二年（1517年），三里河一位名叫戴通的善士首倡，由铁山寺宗洪和尚募捐，得白银2170多两，俱附近居民所集。于是用5个月时间大兴土木，拆旧桥重建，桥身加高四分之一，成十四尺；桥面加宽六分之一，成二十四尺；又于桥侧置石栏杆板、石柱柱，东西引桥铺石路纵向百尺有余，使得整座石桥坚固壮观，远胜往昔。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施工时挖出的古桥。

当初，民间修桥时还在主桥之外建耳桥三座：一座在东，靠南泉寺旁；一座在南，往鞭子巷口；一座在西，通半壁街头。我小的时候，半壁街拐向卧牛胡同的土路上，有一小段大石板路面，拱起在路上，当时殊不可解，于今看来，就是耳桥之一。

桥西有大庙，称铁山寺，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，铁山寺的院落还非常完整，古树丰茂，三里河粮店就在院内。庙很大，后墙在南芦草园，至少在明武宗时，这座庙就有了，院中的《重修三里河桥记碑》记述了武宗时民间集资修桥的事。面对马路的高台阶上则是一家售卖茶叶、糖果和糕点的商店。那时候，我常到这里里的粮店和商店给家里买东西，每逢想起，恍如昨日。

商店往东不远就是北桥湾路口，三里河桥所在地，那座桥过去只闻其名，2001年两广路扩建马路时被工人挖到了。听到消息，我忙到现场观看，只见离地面大约一丈深的地方，桥洞、桥面都显露出来，里面还有污水在流着。20世纪50年代修路时，曾把河改成地下污水线路，此时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条砖石砌成的污水线。

见到这座桥，总算让我了结了一个心愿——因为我就是在这一带长大

的，以前总听老人们说起这座桥，但从未亲眼得见，遗憾了几十年，在铁山寺里观碑文时，对那座桥的模样全凭想象，站在路边揣摩这一带的古风。在北京，大凡老地方，总是萦绕着那么一种气氛，你说不清，但你能感觉到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似的在你眼前晃。

三里河桥北就是北桥湾，街里有北京著名的老字号正明斋糕点铺的作坊，糕点的香味总是飘荡在胡同里，街两侧的铺户一家挨一家，澡堂子、菜市场、杂货铺、羊肉铺、鞋铺和我最爱去的小人书店迤逦排开。小人书店在路东一个门脸房里，里外两间大屋，进门一侧是借阅处的柜台，柜台上摆着几本目录，每一页都是用连环画的封面贴起来组成的，而相应的那本书，则另用牛皮纸做个包封，上面是编号和墨写的书名。60年代初期的时候，花一分钱借一本小人书，往里走，靠墙都是公园里那种排椅，找个清静处坐下来一页页慢慢读，读多久都行，在我是至高的享受。

文化随笔

诚实的奖赏

□ 马厂

许多年前，我和小伙伴们的节假日就是泡书店，只是“泡”得可怜巴巴：天天蹲在书店柜台前，鼻子紧贴柜台玻璃，贪婪地盯着里面的书，活像饿汉看人嘴动，一蹲就是一天。这是没办法的事，那时书店的柜台犹如国境线，读者是不能进的。

那天，忽然有一只手拍拍我的小脑袋：你帮我照看一下。我抬头一

看，是书店的陶会计。那一刻的心情我至今记忆犹新：这是真的吗？我可以到柜台里面去？小伙伴们开始也是一脸震惊，后来就有羡慕和嫉妒的意思了。

我越过“国界”后，认认真真地卖出了好几本书。第一次拉开铁钱的大抽屉，看到那么多票子和钢镱儿，我大吃一惊。现在合计着，总共也就几十块钱而已，但当时一斤猪肉才七毛三分，一年到头也吃不到几回；我的表舅月薪18元，不但养活了一大家子，还买了收音机听呢。

那天陶会计回来后，问卖了什么书，拉开抽屉看看，微笑着点头。自此，他对我更加放心大胆使用，常常出去大半天不回来。而我则感到无比自豪，因为在整个小镇上，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动那个大抽屉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没有顾客的时候，我便钻进柜台“肚子”里面看书，不打烊不走。起初当然是看小人书，后来看大书。开始常常念错，闹了不少笑话。有一次我把“哪吒”读成“那托”，陶会计哈哈大笑，竟然叫我“那托先生”“那托同志”。

随着不认识的字越来越少，我已经不再满足于看浩然的《金光大道》《艳阳天》之类，开始广泛涉猎，以至于陶会计认为我看了许多不是小孩子看的书。那部厚厚的《各国概括》，我不知看了多少遍，至今还能一口说出某个国家的首都、当时的国家元首等等，多年后获得国际关系的学位可能也与此有关。

有一阵子，陶会计对智利总统“阿连德被害事件”很有兴趣，但报

纸上说得很简单。我给他讲了这个事件的细节，他赶紧问我：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从柜子里底下拿出一本书递给他，上面转载了外电的详细报道。当时北京出版了一些内部发行的书，只卖给干部，所以陶会计总把这类书放在不好找的地方，而我总能找到。

后来我曾在网上搜了一下，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、枪杀阿连德总统发生在1973年9月11日，而著名的《各国概括》出版于1972年3月。那时我还不到10岁。都说“60后”生不逢时，一记事就遇到了书荒，而我竟能享受肆意读书的“特权”，直到“四人都”倒台和恢复高考，运气好得出奇。

我上大学之后，我妈妈曾经问过陶会计，怎么敢用小朋友，不怕丢钱吗？陶会计自得地笑了：从来不少钱，还多过一分钱呢。

原来他抽查过！用今天的话说，他对我的信任来自监督。有一次我发现多找了一分钱给顾客，只好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一枚硬币放进抽屉。那是一枚二分硬币，恰好那天抽屉里没有一分的硬币。第二天本想从抽屉里找回一分钱，又怕那个动作会引人生疑，只好认了。我之所以记得这件事，是因为实在心疼那一分钱。

陶会计真是一位哲学家，他揭开的谜底意味无穷，其价值远超阅读的机会。人拥有知识才是锦上的“花”，而绝非“锦”本身。“可靠”是人在世界上能获得最高奖赏，侥幸不得。如果必须选择，我宁愿目不识丁，绝不愿意让人信不过。